

信史立国

姜义华著

瞥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探寻

近

代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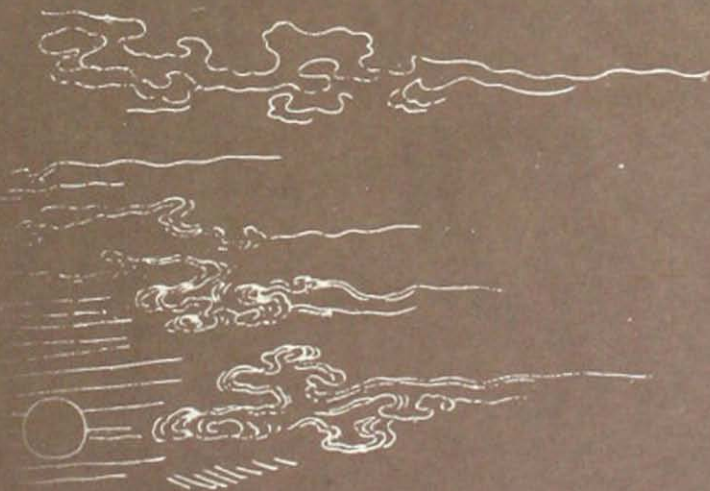
国

研

究

书

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史立国:警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探寻/姜义华
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ISBN 978-7-208-10831-8

I. ①信… II. ①姜…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②中国历史—现代史—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0646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范昊如

·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

信史立国

——警观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新探寻

姜义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0.25 插页 2 字数 428,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31-8/K·1903

定价 52.00 元

总 序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汇集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部分教师的成果,是以主题的形式辑录各教师所发表的专题论文。

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1905年复旦公学高等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有历史学几门课程。1925年正式设系,时称史学系。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得到江浙多所大学著名史学家加盟,实力大为增强。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杨宽等教授;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教授。前辈学者常常言及,那时的历史学系,与中文系一起共同构成复旦文科的“两个超级大国”。此后,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和辛勤耕耘,历史学系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且始终占据复旦文科发展的最前列,用周予同先生的话来说,历史学系的发展就是要“为复旦争取学术地位”。

这其中,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尽管起步稍晚,也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近代史最初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1954年中国史划分为中国上古史(主任胡厚宣)、中国中古史(主任谭其骧)、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主任陈守实),至此中国近代史算是在建制上初步成型。1958年中国史方面的上古史、中古史教研室合并为一(主任陈守实),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则发展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胡绳武)。到20世纪70年代,又形成包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和中

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建制,这些都显示中国近代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形。正是通过蔡尚思、胡绳武、金冲及、汪熙、陈绛、陈匡时、黄美真、余子道、沈渭滨、黄苇、杨立强、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刘其奎、赵少荃等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汪伪政权史、资产阶级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集体编撰的成果即包括有《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资料简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199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成为国内首批五家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这些皆为体现复旦历史学科整体研究实力的标志,内中也包含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贡献。

步入21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又有长足发展。以该学科为主体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姜义华任主任,吴景平、章清任副主任),2004年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此外,本学科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问世,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数十篇专题研究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和《近代中国研究专刊》。本学科每年都主办两次以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使本学科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在海内外的学术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选录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主的部分教师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出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由于作者的年龄、阅历、学术视野和价值取向各有不同而各具特色,但都是这些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开拓挖掘的成果,是多年心血的积累,反映了这些教师的研究足迹和心路历程,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风貌的一角。通过这些著述,可以把握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而且可以以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审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和现在,进而为将来的学科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以专题论文的

形式组织书系的出版,因此,还有不少教师的论著未能收入其中,有的教师此前已有集辑出版;暂时还没有这样考虑的,则只有留待他日了。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尊重历史,尊重此前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学术成果,从历史史实和“历史性”的成果中吸取养分,是“创造”未来学术前沿的前提,也是学术发展永恒的宗旨和道理。我们出版这套书系,在借以回顾和总结以往的成绩及不足之时,同时向学界和社会寻求批评,寻求来自更多层面的交流和沟通,以期共同推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组稿及编辑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付出了不少努力,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编委会

2012年3月

序

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应该怎样拓宽视野，转换视角，突破思维定势，冲破诸多藩篱，更为完整地展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从而更为全面、更为深入、更为准确地了解先前各个世代给今天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哪些资源、哪些主客观条件，提供了怎样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环境，又规定了今天和未来发展什么样的限度，这是近二三十年来，我所一直特别关注的问题。本书所收录的，便是近年来环绕这个问题所写的一些文字。

本书以“信史立国”命名，就是因为我特别深切地感受到：信史，乃是立人之本、立国之基。

信史，就是历史认识始终不渝地坚持系统科学，历史书写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历史评价始终不渝地坚持全面公允。

班固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这就是信史的楷模。信史，是人们一代又一代不懈的追求。中国有着悠久的信史传统，可以说，信史，正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一个重要载体。

但是，要使历史认识、历史书写、历史评价成为真正的信史，并不那么容易。历史资料本身就不可能完整，收集与考订都需要花极大的气力。用特定词语体系描述和构建的历史，与实际的历史经常不相吻合，必须穿越这些话语的屏障，方才能够接近历史的真实。历史真相的揭

示,还会受到各种特殊利益诉求的抵制和阻挠,受到许许多多充满偏见、严重扭曲乃至完全虚构的伪史、秽史的围攻和冲击。因此,要坚持和发扬信史传统,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缺一不可。而自觉的信史立人、信史立国的责任担当,尤为根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已经一再无可辩驳地证明,凡真正做到以信史为决策根据,以信史为立人和立国基础,我们的事业就会健康发展。反之,凡不尊重信史、轻侮信史,我们的事业就不可避免地会受挫。而但凡背弃信史、践踏信史,则必然会受到社会实践无情的惩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还充分证明,要真正做到信史立人、信史立国,固然需要史家具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需要史家有博大而精深的学识和锲而不舍的长期辛勤耕耘、艰苦努力,更需要全社会共同自觉尊重信史,为信史的繁荣创造一个学术上自由探讨、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

本书所涉及的,仅仅是数十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新探寻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只能称做“瞥观”。“瞥观”二字,还表明这些认识并不一定成熟。在将这些文字结集出版之际,特别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姜义华

目 录

序

一、信史立国的峥嵘岁月

中国人文学五十年

从革命布新到人的解放：中国史学六十年

当代中国史学：从帝王之学走向普遍性的人学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论我国历史科学的现代化

二十世纪文明史：当代史学的首要课题

深化与拓展上海史研究的建议

超越思维定势：全面推进民国人物历史研究

走出思想上文化上的“被殖民”

二、堪为楷模的师长

记与共和国同行的上海史学家

“先把生活本身弄个明白”

——周谷城《中国通史》、《世界通史》重印序

“斗争哲学”重围中的孤军奋战

——周谷城六十年代历史哲学新论重评

求真守实 扶奥探幽

——陈守实传

黎澍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拨乱反正

在自由境界中遨游

——读陈旭麓《浮想录》

“马克思主义者总要不断思考”

——追思王元化先生

当代墨家巨子蔡尚思

——贺蔡尚思百岁华诞

中国古代文明的守护者和传薪者

——记马承源

三、备尝艰辛的求索和反省

珍视先行者的哲学探录

——台湾版《章太炎》自序

小农社会：解开中国历史秘密的一把钥匙

——《百年蹒跚——小农中国的现代觉醒》自序

文化危机意识与文化的更新及再创

——《章太炎语萃》编序

从史著看中国史学发展脉络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历史卷)》前言

特立独行章太炎

——《章太炎评传》自序

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之造型

——《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自序

重视思维方式的全面革命

——《理性缺位的启蒙》自序

知识精英的蜕变和新生

——《章炳麟评传》序

要正确了解历史

——《中国历史十一讲》序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中国通史教程》几个问题的说明

时代呼唤思想

——《理性缺位的启蒙》韩文版序

释“中国重撰”

——《现代性：中国重撰》序

孙中山的思想财富

——《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自序

我们文明的核心价值

——《中华文明的根柢》序

四、成就斐然的群体攻坚

负起我们的责任

——《光与影——台湾社会与文化论丛》献辞

重新认识孔子与孔学

——《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前言

学术的大众化与大众的学术化

——读南怀瑾著作

中西孔道 起点于斯

——《知新报》影印本序

重估胡适

——《胡适评传》序

复原真实的澳门

——《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序

澳门历史的反光镜

——《镜海丛报》影印本序

翻译与启蒙

——《20 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序言

孙中山研究的“他山之石”

——《伟人相册的盲点——孙中山留影辩证》序

应重视上海金融史的研究

——《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序

治史贵有魂

——《史魂》序

再现农民生活场境的努力

——《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序

慎思笃行

——《慎思集》序

袁世凯的多重性格与多面作为

——《袁世凯与近代名流》序

黄山脚下的知青故事

——《知青部落》序

在文明转型和民族复兴中发现与创造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序稿

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座丰碑

——读《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家谱中的地方文化

——《常州家谱提要》序

上海地方自治的全景考察

——《上海地方自治研究》序

西学东渐的一个剪影

——《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序

乡村社会转型与中国现代化

——“革命与乡村”丛书总序

婚姻制度实证研究的力作

——《婚姻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序

努力推动陈独秀研究

——《陈独秀与 20 世纪中国》序

中国近现代公共舆论构成再认识

——《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
(1904—1932)》序

湖南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湖湘文化与湖南的尊孔读经(1927—1937)》序

复旦史苑的缩影

——《光华文存·史学卷》序

中国近代思想学术谱系的延续与更新

——《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序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北洋集团

——《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序

重新研究土地改革运动史

——《地权变动与社会变迁》序

中国会展业的兴起与发展

——《百年演绎：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嬗变》序

中国近代“政治学科”形成前史研究

——《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序

治史不能止于史料的爬梳排列

——《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序

更重要的是文化、精神与思想

——读陈占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

历史上的钓鱼台列屿

——《钓鱼台列屿——历史与法理研究》序

辅仁之道

——《同仁：孙中山与梅屋庄吉》序

以世界眼光考察中国发展路径

——读张维为《中国震撼》

中国传统城市转型的缩影

——《非条约口岸城市化道路——近代长江三角洲的典型考察》序

有大觉悟 成大功德

——《印光法师行业考》序

五、赘语

不敢懈怠的责任担当

——学术自述

一、信史立国的峥嵘岁月

中国人文学五十年

人文科学通常被认为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又非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的总和，它包含现代与古代语言文字、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伦理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艺术实践与艺术批评、美学等广泛的领域，即包含着关于人的人文追求、人文素养、人类价值及其精神表现的各种学科。五十年来，所有这些学科，在我国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又都经历了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

从“废名”到“正名”

20 世纪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差不多整整三十年，人文学科一词从我国消失了。人文科学所涵盖的各学科，全部被纳入“哲学社会科学”中。中国科学院建立时，设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省建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种学会联合会时，定名为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甚至当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时，也只用社会科学，而不提人文科学。

当然，并不是中外各种古代与现代语言文字研究、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研究因此便不复存在。但是，它们统归之于社会科学，正表明，它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或独特性已不复被重视，或根本不予承认。它们已被视为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一样，在其性质上，属于意识形态，为一定经济基础及一定社会阶级利益服务的上

层建筑,在方法论上,不再像先前那样注重人类精神现象的独特性、多样性、复杂性和创造性,而转向专门研究人类精神现象多样性中的一致性、特殊性中的普遍性、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复杂性中的统一性、变化创新中的规律性。

不承认人文科学有别于一般社会的特殊性质,给人文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影响,集中地表现为:极度地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及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与庸俗化倾向。

首先是极度地泛政治化。所有人文科学都被确定为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复辟的工具,即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工具。人文科学所负有的认知、情感、审美功能,即全面提高人的知识、道德、感情、心境、情趣等人文素质的功能,反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都被认定必须从属于或服务于上述政治功能,这就必然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为狭隘的短视的功利主义和现实政治需要所主宰,使人文科学独立的学术研究根本不能立足。

其次是极度地泛意识形态化。这就是拒绝承认精神生产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生产活动,是一种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并以物化了的客体状态将其产品贡献于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些产品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意识形态,属于服务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是,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应当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作为客观事物本质规律的反映和再现,它们不是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中外各种古代的及现代的语言文字,以及研究这些语言文字的语言学,就明显不过地表现了人文科学中许多重要构成部分的这一性质。泛意识形态化,如果不说是实际上取消了,那至少也要说是严重削弱了精神生产这一地位并不稍次于物质生产的社会生产活动,使非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使得人类是否具有共同的人性,真理是否具有阶级性,是否存在人类共同认可的形式美、自然美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无法实事求是地探索下去。

极度地泛政治化和极度地泛意识形态化,势必导致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经常陷入公式化、概念化及庸俗化的泥淖。人文科学本来主要是研究人如何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以及人自身,包含人的整个

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研究连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观念形态如何产生并如何作用于社会,从而保障人自身存在、发展与解放,推动人的权利、人的价值的不断提升及有效实现,并以人的真善美普遍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为自己的最高目标。然而,泛极度政治化与泛意识形态化,不可避免地使人文科学从基础研究变为单纯的应用研究,变成现成公式的图解与现行政策的诠释,走向极端,便是“文化大革命”中百花凋谢之后影射文学、影射史学及阴谋文学、阴谋史学的肆虐。

人文科学名称的废弃,亦即人文科学不再被当作一门自具特点的科学对待,不可避免地给我国人文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伤害。但是,尽管如此,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从我国学术界消失了的三十年里,我国人文科学所属的若干学科,包括语言和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特别是考古学,在艰难曲折之中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一场又一场论战中,许多学者不断辩白和坚持应当承认和尊重人文科学所固有的特点。五六十年代关于语言有没有阶级性的论争,关于“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的论争,关于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论争,关于美的共同性与阶级性的论争等,所触及的问题,可以说,都是从一个侧面对于抹杀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界限提出婉转的抗议。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逐步深入,人文科学应当是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相并列的一大门类,这一点逐渐为人们所承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人文追求与人文素养,人类形成起就已产生。人文科学本就是一门最为古老的学科。人文科学的生命力于今非但没有衰减,反而空前旺盛。这是因为,随着人类一步步走出采集渔猎经济时代与农耕经济时代,而先后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并已经在准备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求真、求善、求美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人文追求与人文素养,有着代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些基本的共同的方面,也有着代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个人的相异的方面。实践已经充分表明,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物质生产不断发展与物质生活不断提高,而且更需要人文追求和人文素养的不断调适、不断提升。否则,人类就会在物